

计划经济、行政性分权和市场经济

Planned Economy,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陈向新 王则柯

(中山大学经济系 广州 510275)

有的外国经济学家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成就时说,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分权”。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篇题为《步履蹒跚的国家》的文章指出,下放经济权力带来一系列不愉快的副产品,如市场分裂、基础设施受忽视、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下降、金融和货币政策失控等。

我们还常听到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本文将在微观经济的层次上,对分权的概念及其后果、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区别作一简单阐述。

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经济资源是稀缺的。也就是说,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论是土地、森林、油矿等自然资源,还是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非自然资源,它们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是有一定的量的限制的,甚至似乎不值钱的水和空气都是稀缺的。地处沙漠的阿拉伯国家水贵如油,在日本,罐装的新鲜空气也身价不菲。无声无息“逝者如斯乎”的时间也不例外,“一寸光阴一寸金”正是这种稀缺性的通俗表述。

既然资源是稀缺的,那么一种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投入量的增加意味着必须减少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投入量。所以,稀缺资源的不同配置影响产出水平结构,从而决定人们的需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因此,为了利用稀缺的资源使人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使效用达到最大化,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这种目的在于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组织安排称为经济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它们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同,导致的经济成果也不一样。为了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现代经济学假定,对一定的经济环境,包括资源的初始配置、技术、偏好(或效用函数),以及经济活

动中各种主体所知道的信息,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或一组不依赖于经济体制的最佳资源配置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即不损害一些人的利益便无法再改善另外一些人的处境。这样,考察一个体制是好,还是坏,只要考察它是怎样发现并实现(或至少是接近)这个最优状态的就够了。

二、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

市场和计划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被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

在市场经济中,有三类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和政府,消费者和企业是基本的微观决策单位。每个经济主体根据自利的原则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虽然政府有时也参与微观决策活动,但其主要经济职能是制订“游戏规则”,即建立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制度上、法律上的保障,并在必要时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如执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所以,在微观的层次上,消费者和企业是讨论的主要对象。

关于经济学上的“人”,现代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定,即假定其是自利的和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活动是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利”在这里是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词,不含有损人利己的贬义。这一点和平时的思维习惯有着本质的不同,切莫望文生义。自利非但不意味着损人,常有的倒是既利己又利人。经济主体是理性的表现在力图使自己的活动带来的满意程度最大。对消费者而言,每个人根据他的偏好和财富预算决定他所消费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使其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来说,每个厂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其生产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市场是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企业联结起来的纽带,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愿的、互利的交易。一方面,通过产品市场,个人作为商品的消费者从企业那里购买商品,其消费支出成为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要素市场,个人作为资源所有者向企业提供资源服务,所得的收入就是企业作为资源服务使用者的支出。这样,从自利的原则出发,通过自愿互利的交易,消费者和企业同时达到各自的目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社会的福利提高了。这个结果,福利经济学将其归纳为一个基本定理,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学家还进一步严格证明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可由市场竞争得到,即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这两个定理说明了,市场具有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的功能。

市场之所以有这种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功能,价格机制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则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减少,同时厂商增加这种商品的供应;价格下降会使需求增加,供应减少。所以,价格的波动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供求关系对价格也有调节作用。供求关系和价格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供求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

这里,价格起了双重的作用。它既是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指示器,又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调节器,因为价格直接决定了经济主体财富的社会价值。可见,市场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因为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为各个主体提供了灵敏的信息机制和合适的激励机制。

概括起来,自主的企业和竞争的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两大要素,而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即市场定价)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三、计划经济的前提谬误

与市场经济不同的是,计划经济中只有一个决策机构。从工厂生产产品的种类、数量,到原料的来源,以及产品的销售渠道;从产品的定价到销售收入的分配,甚至连个人的就业选择,都是由一个中央计划机关所作出的无所不包的详细计划来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断定,而且实践也证明了,计划不可能合理地配置资源,这是因为,用计划方式来协调资源的配置存在下面两个不可克服的缺陷。

一是知识不足和信息不完全。 为了给全社会范围的资源配置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中央计划机关必须掌握所有资源的现状、工厂的技术设备情况、消费者的需求等信息,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对消费者的偏好,更是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准确的信息。而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瞬息万

变,这种变化不可能在计划中得到及时的反映,这一点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来说显得尤为突出。信息不完全,制定正确的计划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更进一步讲,即使能够掌握完全的信息,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处理数量如此巨大的信息,将其转换成包含几百万条甚至更多指令的计划。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解一个包含很多个变量和方程的系统,这种计算就是当代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不能胜任,而不是象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晚年所幻想的那样,“在一秒钟之内得到解”。

二是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 由于社会存在广泛的利益矛盾,各个经济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可能隐瞒自身的真实信息,从而使中央计划机关从基层收集到的信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有些失真或扭曲。再者,就算信息是完全、无误,并且能够据此计算出正确的计划,在计划层层分解并下达执行的过程中,也会由于不同层次之间,以及同一层次不同主体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发生偏差。这就是说,缺乏正确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激励。

既没有制定计划的正确前提,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手段来计算,也没有使计划执行者的行为跟计划当局的期望保持一致的激励,计划当然不可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虽然也存在价格,但是价格既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因而是扭曲的。扭曲的价格信号必然引导资源的错误配置或低效配置。

四、行政性分权及其弊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中信息的传递是横向的,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信息交流。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信息的传递是纵向的,行政机关向企业下达指令,企业向行政机关报告生产经营状况,并提出各种要求。为了保证计划的贯彻执行,这种行政协调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垂直等级结构,企业成为处于这一结构最底层的单位,成为行政权力机关的附属物。

众所周知,权力过度集中的后果是严重地束缚了基层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既然如此,能否将权力下放以激发基层的积极性?

分权,是指决策权力从等级结构的顶端向基层转移。分权有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之别。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不改变原来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的机制,而仅仅在行政系统内的各层次间作权力调整。经济性分权又叫市场性分权或完全分权,是指在改变行政系统职能的同时,把微观决策权还给面向市场的企业,即让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

经济主体而不再是行政机关的附庸。

在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之间,有几种中间状态。如果将决策权力机构简化成三个等级即中央单位、中间单位(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企业),而以“+”号表示在转移过程中权力有所扩大,“-”号表示权力缩小,那么有如下表所示的五种不同分权结果:

	1	2	3	4	5
中央单位	-	-	-	-	-
中间单位	-		+	+	+
基层单位	+	+	+		-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分权,既有经济性分权的因素,也有行政性分权的因素,大致对应于表中第3种情况。

的确,与改革前传统体制下那种大一统的情况相比,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经济性分权即市场机制的引入,而行政性分权正在起着越来越严重的负作用,成为双重体制并存和胶着的重要原因。

行政性分权的结果,是出现了活跃的中间层,其行为具有非规范化和短期化的特点。

首先,对上同中央讨价还价,对下“管、卡、压”,强化对属于自己管辖的企业的微观干预,其程度与传统体制下中央机关对企业的干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强化了干预造成企业的“双重依赖”

状态:一只眼睛盯着上级官僚,一只眼睛盯着市场。

其次,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免受与外地企业竞争所带来的市场压力,地方政府在各自辖区内采取封锁和分割,妨碍商品和要素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严重破坏市场的统一性和竞争性;对外则互相压价,自相残杀,削弱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换句话说,行政性分权造成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局面。

第三,为了增加纯收入而不是利润,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扩大投资规模,盲目发展短期内盈利高的企业和产业,加剧了重复建设。最典型的例子是冰箱行业,在过去几年中仅是杭州市就一哄而上,建了30多家电冰箱厂。在全国上百家电冰箱厂中,一般年产量都在20万台以下,而万宝集团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年产70万台,没有一家达到国际公认的年产量80~100万台的经济规模。

最后,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使国家的税收、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行政性分权不仅导致了社会经济资源的低效配置,造成大量浪费,而且还产生了其他经济问题。例如,双轨制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毫无疑问,行政性分权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背道而驰的。

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行政性分权也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的穷途末路。只有尽快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彻底摆脱行政干预,成为面向竞争市场的独立主体,我国的改革才能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 冷远猷)

科技动态

全国第一届系统可靠性及概率风险研究学术交流会召开

1993年5月24日至6月2日中国运筹学会可靠性学会于重庆—武汉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系统可靠性及概率风险研究学术交流会。会议由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主办,重庆大学系统工程及应用数学系和武汉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协办。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市及军队的有关院校、研究所以及工厂,企业的67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出席了会议,论文集收入论文57篇。

会议听取了学会顾问何国伟教授关于从以性能为主转变为以效能为主的新的质量观的报告。他指出效能是可用性、可信性和固有能力(主要和性能有关)的综合,其数学公式为 $E=ADC$ 。这种质量观的转变来之不易,海湾战争的巨大冲击波,终于使我国有关部门特别是军队最高决策层,认识到可靠性的重大意义。他的报告,观点新颖,论证有力,与会代表深受启发。

代表们还观看了由清华大学等单位设计的故障树分析,自动建造故障树、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和系统可靠性预计等七个计算机软件的演示,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和咨询。代表们对计算机演示这种信息交流方式表示赞赏。认为应继续加强推广高质量的成熟计算机软件,以节省大量开发软件的人力和物力。

高级研讨班的重点课题为大型复杂可修系统的可靠性、维修性问题,软件可靠性的理论和应用现状,灾害的风险管理等。清华大学等院校所的代表作了重点发言。代表们特别对重点发言中关于大型复杂可修系统的模型化方法,动员巨大人力物力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的坦克的可靠性、维修性数据的现场统计和处理,以及中国社会风险本底的社会调查资料感到兴趣。

可靠性研究在我国只有十多年的历史,能获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然而比之发达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我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加强学术理论和实际应用部门的合作。这是代表们一致的看法。会议产生了以清华大学梅启智为主任委员的系统可靠性及安全性专业委员会,下一届年会将在1996年举行。

(宋钧)